

## 戴高樂和右派結盟之研究

---

### De Gaulle Factor in the Coalition of French Right Wing Parties, 1946-1969

胡祖慶 *Francis Hu*

東海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Tunghai University*

#### 摘要 / Abstract

本文試圖探討 1946 到 1969 年間，戴高樂如何替右派結盟打下基礎。在這方面，1958 年可以做為分水嶺。1958 年以前，戴高樂試圖藉由法國人民聯盟 (RPF) 達成修憲和執政目標。之後，戴高樂透過新共和同盟 (UNR) 整合右派及部份中間與左派選民。1968 年，UNR 改組而來的捍衛共和同盟 (UDR) 協助戴高樂渡過是年 5 月危機。然而，第二年戴高樂便因為公投結果失利辭職下台。

From 1946 to 1969, General de Gaulle established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alition of French right wing parties. In this respect, 1958 is a watershed. Before 1958, de Gaulle's RPF aimed at forming a majority government and rewriting the constitution. After 1958, the UNR tried to create a broad electoral base from the right to the left-center. When this effort failed, de Gaulle stepped down in 1969.

---

**關鍵詞：**戴高樂、法國人民聯盟、新共和同盟

**Keywords:** de Gaulle, RPF, UNR

## 壹、前言

在2007年5月和6月法國的總統和國會改選中，Nicolas Sarkozy於總統選舉方面輕鬆獲勝，他所得到的53%選票只略遜於戴高樂在1965年獲得的55%得票率；然而，稍後François Bayrou領導的民主運動黨（MoDem）卻重創人民運動同盟（UMP）趁勢追擊並大獲全勝的機會，相較於UMP在國會選舉第一輪投票中得到46%選票，創下1968年以來最佳成績，民調甚至顯示該黨最多可望在第二輪投票奪下史無前例的460席，但最後結果只有340席，反而比上屆減少了30席，從而再次突顯政黨結盟的重要性。無論如何，Sarkozy仍同時保有總統和國會多數，並延續右派及戴高樂派優勢政黨地位。<sup>1</sup>本文試圖以1958年做為分水嶺，探討1946-69年間戴高樂試圖藉由法國人民聯盟（RPF）達成修憲和執政的目標，並為右派結盟打下其基礎之過程。在透過「新共和同盟」（UNR）整合右派及部份中間與左派選民後，UNR改組而來的「捍衛共和同盟」（UDR）曾於1968年協助戴高樂渡過是年5月危機。<sup>2</sup>

## 貳、法國人民聯盟與戴高樂派之發展

歐戰期間，由於維琪政府和納粹德國合作（collaboration），以致對右派造成嚴重傷害。<sup>3</sup>在反抗軍總部（CNR）於1944年3月所發佈之處置維琪政府

---

<sup>1</sup> 有關優勢政黨（majority party）的探討，見胡祖慶，《政黨合作與結盟》（台北：書泉出版社，2006），頁7-9。

<sup>2</sup> 1947-69年間，戴高樂派多數是右派主要政黨；除得到1/5選民支持外，若和友黨合作則可得到1/3選票。如果戴高樂親自出馬，約可得到2/5選民支持，假設它和左派形成對決局面，大抵能夠得到過半選票。見Andrew Knapp, *Gaullism since de Gaulle* (Aldershot: Dartmouth, 1994), p.1. 當然，例外情形所在多有。1958年初，法國因為阿爾及利亞問題陷入危機。雖然認定戴高樂是化解危機第一人選的選民最多，但是比例只有13%。

<sup>3</sup> Rémond指出，20世紀右派選民基礎持續成長，直到1981年才稍稍受挫。1902年其得票率是47.88%，在1974年和1978年來到50.66%和51.06%。見René Rémond, *Les droites en France*

官員綱領中，Edouard Herriot 甚至表示「在法國重建之前，或許得再度經歷血流成河場面。」<sup>4</sup>1945年4月，臨時政府再度發佈命令，成立特別法庭受理當事人上訴事宜，其中231位右派參議員和國民議會議員提出申訴，占同類案件49%，但勝訴比例僅有29%，低於平均值36%，同時舉行的市鎮選舉也反映出右派勢力下滑趨勢，執政比例由1935年的63%降至38%。儘管如此，戴高樂仍認為法國人民必須團結共同抵禦即將出現的外來威脅，因此應減少報復程度；<sup>5</sup>也因此右派得以陸續組成農民黨，共和協約黨以及自由共和黨（PRL）等。進言之，由於左派和右派積不相容，致使反抗軍總部未能組成擬議中的「反抗軍黨」；在其三個主要成員中，共產黨和社會黨屬於左派，而中間路線的MRP則較得到戴高樂認可以及右派選民支持。<sup>6</sup>

如前所述，反抗軍總部綱領對於未來憲政架構著墨不多，唯一共識是「建立權責相符的民主政府」，避免重蹈第三共和覆轍；但因維琪政府經驗使法國人民不樂意見到強大的行政部門，再加上右派失去制憲主導權，致使戴高樂的雙首長制主張無法實現。以反對第四共和憲法為基礎成立的法國人民聯盟（RPF）也被視為戴高樂派之濫觴。事實上，第四共和制憲過程始於戴高樂擔任臨時政府總理期間，他主張循公民複決決定憲法內容，並得到社會黨和MRP支持。1945年10月就制憲議題舉行公投結果顯示，96%選民贊成制定新的憲法，此外有66%贊成制憲會議通過的憲法條文應交由公民複決。<sup>7</sup>由於黨紀嚴

---

(Paris: Aubier, 1982), p. 261.

<sup>4</sup> Maurice Larkin, *France since the Popular Front*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24；關於1944年以後右派人士遭到整肅的情形，可見 Jean-François Sirinelli, *Histoire des droites en France* (Paris: Gallimard, 1992), pp. 337-339.

<sup>5</sup> 例如1940年戴高樂流亡英國，並且公開反對和德國簽署停戰協定。維琪政府將他交付當事人缺席的軍法審判。在軍事法庭上，戴高樂被判處死刑。儘管如此，1945年戴高樂相當迴護年邁繫獄的貝當元帥。

<sup>6</sup> MRP成立於1944年11月，起初以天主教會人士為主要骨幹，一方面接受共和體制，另一方面試圖調和教會與勞工階級利益，性質接近西歐國家的基督民主黨。但也有人將MRP視為左傾政黨，見 William Safran, *The French Polity* (NY: Longman, 2003), p.7.

<sup>7</sup> 有關第四共和制憲過程，見 Pierre Pactet et Ferdinand Mélin-Soucramanien, *Droit constitutionnel* (Paris : Dalloz, 2006), pp. 294-298.

格的共黨，社會黨和 MRP 掌握制憲會議過半席次，因此戴高樂決定在 1946 年 1 月辭去總理，目的是促使三黨聯合政府垮台，從而使其可通過雙首長制修憲案做為復出條件。最後，雖然 MRP 反對，共黨與社會黨仍聯手草擬一部內閣制和一院制國會憲法，並在 1946 年 4 月獲得通過，但最終在公民複決過程中受到挫折。在同年 6 月再度舉行的制憲會議選舉中，戴高樂在 Bayeux 發表立場演說；這項演說重點成為 1947 年 RPF 成立基礎，並在 1958 年第五共和憲法中得到實現。

1946 年中，René Capitant 發起成立所謂「第四共和的戴高樂同盟」(Union Gaulliste pour la Quatrième République)，但宣稱這不是個政黨，支持者可保有原先政黨認同，隨即並得到 100 萬名支持者；對此 MRP 表達不滿，它指出戴高樂這個名字應該持續做為團結象徵，而非分歧來源。於此同時，聯合政府的三個主要政黨為避免讓戴高樂派有可趁之機，共黨和社會黨同意將改成兩院制，MRP 則放棄強化行政權的主張，致使第四共和與第三共和憲法相去不遠。至於戴高樂則在 1946 年 9 月發表聲明反對憲法草案，並中止和 MRP 的友好關係。10 月，這部憲法交付公民複決，雖得到 900 萬選民贊成通過，但是反對加廢票卻占全體選民 62.3%。

在 1946 年底的國會選舉中，共產黨成為第一大黨，並在法國本土取得 165 席；共黨，社會黨和 MRP 共獲得 73.2% 選票。同年底，戴高樂向 Jacques Soustelle 等透露籌組 RPF 的計畫，並於 1947 年 4 月正式成立，宗旨包括修憲、中止政黨把持政府現象以及建立強大公權力機構，Soustelle 則成為首任秘書長。與此同時，社會黨總理 Paul Ramadier 為爭取美國援助，於該年 5 月將共黨逐出聯合政府行列，而 RPF 則趁機組成國會黨團，但重申成員可保有原先政黨認同，除了共黨議員之外，而鄙視傳統政黨的戴高樂也不斷宣稱 RPF 只是項群眾運動。<sup>8</sup>不過，1947 年 10 月市鎮選舉仍是 RPF 的第一次考驗，結果在居民超過

---

<sup>8</sup> 戴高樂常將第四共和的失敗與政黨政治畫上等號，見 Anne Stevens,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France* (London: Macmillan, 1996), p.227.

9000 人的市鎮中，RPF 得票率是 35%，遠高於共黨的 20%。選後戴高樂要求解散國會並以兩輪投票制取代比例代表制。在這波風潮當中，MRP 受創最重，因此兩黨關係持續惡化。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在前述市鎮選舉中獲勝，RPF 仍面臨若干問題，首先是許多和維琪政府關係密切者投身 RPF，而戴高樂推動國會改選也招來批評。至於不甘束手就縛的聯合政府也看出 RPF 的幾個弱點：第一，基於反共立場，RPF 沒有可能和共黨合作；第二，出自戴高樂大破大立見解，RPF 國會黨團必須儘快達成倒閣目標，然而 RPF 黨團即使加上共黨也無法成功倒閣。無論如何，RPF 實力仍持續增強。在 1948 年國會選舉中，RPF 決定和左派共和聯盟（RGR）及反抗軍社會民主同盟（UDSR）等小黨合作，<sup>9</sup>雖引發若干省級黨部反彈，但 RPF 在上議院議員還是從 43 位增加到 130 位，其中包括 56 位 RPF 議員和 74 位具備雙重黨籍議員。<sup>10</sup>儘管，RPF 從 1947 年市鎮選舉到 1949 年郡級選舉可說連戰皆捷，但套用戴高樂的說法，它只贏得戰役而非戰爭，甚至 1948 年後 RPF 黨員還逐漸減少，而國會黨團成員和黨中央之間也不時發生磨擦。<sup>11</sup>為解決爭議，戴高樂勉強同意 RPF 國會黨團幹部進入黨中央決策圈。

如同 MRP 與 PRL，CNI 和 RPF 之間是種競合關係，其領袖 Paul Reynaud 是位資深的右派政治人物。1951 年，CNI 和農民黨共同組成 CNIP，由於兩黨選民分佈在不同地區，因此容易達成合作協定。同年國會選舉後，若干 PRL 和幾位主張平反維琪政府的議員也相繼加入 CNIP。由於新的國會選舉辦法不利於缺乏盟友的政黨，RPF 內部出現和其他政黨結盟的聲浪，對此，秘書長 Soustelle 表示反對，戴高樂則一度表現猶豫不決，最後雖然宣佈 RPF 將孤軍奮戰，但仍允許 RPF 在 95 個選區中的 11 個進行結盟，事實上此類選區最後

<sup>9</sup> 也有人認為 RGR 事實上是右派政黨。

<sup>10</sup> 這 74 位議員有 26 位來自 RGR，11 位來自 PRL，16 位來自農民黨，以及 20 位來自獨立共和黨（RI）。由此可見戴高樂對於中間偏右選民的影响力。

<sup>11</sup> 1948 年 7 月，知名度不高的參議員 Roger Duchet 鼓吹成立無黨聯盟（CNI）。他的著眼點在於拉攏中間選民，保衛地方仕紳（notables）利益。1949 年 1 月 6 日，該黨正式運作。

達到 38 個，不過 RPF 只得到 121 席，雖成爲第一大黨，卻無法左右政局。反倒是得到 91 席的 CNIP 顯得舉足輕重，<sup>12</sup>該黨領袖 Antoine Pinay 更以超黨派形象受命組閣，從而引起 RPF 的激烈內鬨。<sup>13</sup>

儘管如此，兩項因素影響 RPF 內鬨的輕重程度。首先是東西冷戰和左右對抗。Pinay 政府的中間路線和拼經濟主張最初雖得到多數選民認同，不過，隨著 1952 年簽署歐洲防衛共同體（CED）條約引起軒然大波，戴高樂和 RPF 仍迫使其在同年底辭職。其次，RPF 內部對於是否支持甚至加入執政團隊意見不一，國會黨團和黨中央的分歧越演越烈，某些議員甚至公開挑戰戴高樂權威，表示無法同意爲反對而反對的立場。7 月，RPF 舉行黨代表大會試圖化解危機。戴高樂親自出席並表達整合意願，然而 RPF 仍陷於分裂。和戴高樂意見相左的 32 位議員另組社會及共和行動黨（ARS），由 Edmond Barrachin 出任黨主席。1953 年，RPF 議員進一步從 89 位減少成 84 位，同年 Jacques Chaban-Delmas 帶領其中 81 位支持 René Mayer 組閣，促使 RPF 融入第四共和體制。這和戴高樂原先規畫顯然背道而馳，於是他在同年 5 月決定解散 RPF 國會黨團。稍後，RPF 國會黨團改組成社會行動共和同盟（URAS），由 Chaban-Delmas 出任主席。1954 年，ARS 議員加入 CNIP 黨團，使其增加到 132 席，成爲國會第一大黨，更因總統和總理都來自該黨團，致使 CNIP 前景看好。除了受第四共和體制馴化以及 CNIP 壓制外，戴高樂派也必須因應極右派布熱德黨（Poujadist）的興起。1953 年中，RPF 市議員 Pierre Poujade 公開鼓吹小型店家抗稅行動，並發起組成捍衛小型店家利益同盟（UDCA）。

1955 年，戴高樂回鄉撰寫戰爭回憶錄，形同退出政壇，RPF 也暫時中止運作，Chaban 則和社會黨達成選舉同盟「共和陣線」，但戴高樂派候選人合計

<sup>12</sup> 除了 CNIP，維琪政府時期右派領袖也頗有新獲。1951 年初，André Mutter 等人刊行的「法國心聲」（Parole française）洛陽紙貴。呼籲政府實施大赦是它的主旨。稍後，貝當元帥的辯護律師 Jacques Isorni 組成獨立共和團結同盟（UNIR），在 14 個選區參選。在若干選區，它和 CNIP 達成結盟協定。

<sup>13</sup> CNIP 內部也有些問題。在兩個主要派系當中，Pinay 曾經是維琪政府閣員。Joseph Laniel 則是反抗軍總部要角。

獲得選票不過 4%，遠不如 RPF 在 1951 年取得的 21.6% 得票率。1956 年國會選舉當中，戴高樂派雖表現欠佳，但布熱德黨卻對 CNIP 構成威脅，較諸選舉前夕大約損失 40 席。布熱德黨則以 11% 得票率拿下 52 席，其中 11 席被取消當選資格。<sup>14</sup>

### 參、第五共和成立與新共和同盟

1958 年初，法國因阿爾及利亞危機來到內戰邊緣；總統 Coty 認為情勢已到了無法收拾的地步，並希望依憲法敦請戴高樂出山。1958 年 6 月，國會以 329 對 224 票同意，戴高樂隨即組成大聯合政府；國會並授予其 6 個月緊急權力並草擬新憲。據此，第五共和憲法在同年交付公投並得到 83% 贊成票。<sup>15</sup>多數法國選民並不在意憲法內容，而是將公投視為對於戴高樂的信任投票。雖然戴高樂希望保持超黨派形象，其左右手仍開始推動整合以面對即將到來的國會選舉。10 月，新共和同盟（UNR）成立，成員包括 5 個支持戴高樂政團，宗旨是避免戴高樂派候選人在同個選區自相殘殺。

顯而易見地，在臨時政府規定依兩輪投票制選出新國會後，其結果如預期般地產生削弱左派和抑制小黨的作用；UNR 得票率略遜於共黨，卻得到 212 席，相對地共黨只得到 10 席。<sup>16</sup>總的來說，UNR 是最大贏家，它的得票率回到 1951 年 RPF 的水準。同年 12 月，戴高樂在選舉人團以 78.5% 得票率當選總統後，<sup>17</sup>隨即任命 Michel Debré 出任總理。1958-62 年間，第五共和運作接近 Debré 起草憲法時的規畫，具政黨傾向的總理負責日常政務，超黨派的總統則處理國防、外交及歐體與阿爾及利亞問題。與此同時，戴高樂充份運用公投

---

<sup>14</sup> 民族陣線（FN）領袖 Le Pen 在這次選舉中是最年輕的國會議員，進而踏入政壇。

<sup>15</sup> 如果以合格選民計算，這項比例將減低為 66.4%。除了布熱德，所有右派政黨都表達支持態度。

<sup>16</sup> 見胡祖慶，《比較政府與政治》（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07），頁 122-123。

<sup>17</sup> 這個 8 萬人組成的選舉人團和選舉參議員的幾乎是同一批人；稍早戴高樂被授權草擬第五共和憲法，曾經承諾總統採行間接選舉。



和人民對話。他在 1959 年表示將透過住民自決處理阿爾及利亞問題。這項宣示引發右派內部雜音，但很快地異議者便被扣上極右派帽子，且不見容於多數陣營。1961 年 4 月，戴高樂要求人民針對阿爾及利亞自決問題進行公投，結果正方得票率是 75%。1962 年 4 月，他又將艾維亞協定 (accords d' Evian) 交付公投，並得到 90% 支持。正因極右派日漸式微，在右派陣營內部，接下來的戲碼便是中間偏右勢力 (下文稱保守派) 和戴高樂派間的競爭。<sup>18</sup>

1962 年 10 月，修憲議題讓戴高樂站到政黨競爭的第一線。這迫使其他右派政黨選邊站，進而反省自身定位。左右對峙成為第五共和政黨政治基調。與此同時，右派內部保守派和戴高樂派的矛盾浮現，並且在 1969 年後各項全國性選舉當中得到確認。由於戴高樂決定修憲將總統改為直接民選；<sup>19</sup>此舉招致 UNR 以外各主要政黨反對，從而組成「反對大聯盟」(cartel des non)。事實上，右派政黨對戴高樂和 UNR 的不滿有跡可循，例如 1960 年 CNIP 黨代表大會便抨擊「專斷和不負責任的總統制，以及技術官僚獨斷獨行」。保守派和戴高樂反目，部份原因出在後者拒絕繼續給予農民豐厚補貼。至於 MRP 則以不贊同戴高樂處理阿爾及利亞問題的方式為由，促使其成員在 1962 年退出聯合政府。影響所及，第五共和出現唯一的一次倒閣成功案例。<sup>20</sup>1962 年 10 月，國會以 280 對 241 票對 Pompidou 政府提出譴責，戴高樂隨即解散國會，並以公投結果賭上自身的總統職位。隨著法國人民在 10 月以 61.8% 選票通過總統直選的憲法修正案，UNR 也跟著積極準備其後的國會改選，至於戴高樂則在選舉期間公開支持，從而使其由超黨派仲裁者變成實質的政黨領導人。最終 UNR 大獲全勝，保守派和 MRP 受創嚴重，社會黨魁甚至 Mollet 被迫呼籲選民支持

<sup>18</sup> 保守派也稱為自由派 (droite orléaniste) 或溫和派 (droite modérée)。戴高樂派則被某些人視為天主教社會主義 (catholicisme social)。後者支持民主政治當中的雅各賓傳統，排斥中介團體和代議原則。

<sup>19</sup> Larkin 指出，戴高樂的修憲決定出自兩項考量。第一，由於阿爾及利亞問題得到和平解決，戴高樂聲望到達巔峰。第二，戴高樂擔心遭到暗殺，新總統將不具備如他一般的統治正當性。稍早，主張保有阿爾及利亞的極右派人士曾經提出暴君誅伐的論調。不過，仿效美國設置副總統的提案遭到排除。見 Larkin, *op.cit.*, p.291.

<sup>20</sup> 見胡祖慶，前揭書，頁 59-60。1962 年 4 月，龐畢度接替戴布瑞出任總理。

共黨候選人，再加上制度因素催化，左右對峙現象開始成形。

面對新形勢，保守派可選擇的因應策略相當有限。首先，它試圖仿效第三及第四共和前例，聯合左右陣營的溫和派組成足以執政的第三勢力；其次則設法作為決定左右陣營勝負的關鍵少數。1966 年後，保守派事實上同時採取上述兩項策略，以便迎接後戴高樂時代來臨。即使和戴高樂派結盟，RI 仍試圖建立不同的政黨屬性，例如它在 1963 年底提出 5 項修憲建議，但重點並不在修憲，而是企圖和 UNR 做出區隔。<sup>21</sup>1965 年的總統選舉，基本上是戴高樂和社會黨候選人對決的局面。爭取社會黨提名的 Gaston Defferre 主張組成從 MRP 到共黨的中間偏左同盟，<sup>22</sup>但在 Mendès-France 的推薦下，最終由 François Mitterrand 代表社會黨出馬，<sup>23</sup>至於在右派方面，戴高樂並不急於推動政黨合作。如同以往一般，他決定以高姿態投入選戰，例如直到選前一個月才宣佈參選，此外亦無意使用電視台依法提供候選人的廣告時段。<sup>24</sup>無論如何，戴高樂並未能如同預期般在第一輪中得到過半數選票當選，因此他一度考慮退選。其次，戴高樂將主要責任推給總理 Pompidou 對日後右派結盟造成影響。跡象顯示，戴高樂的政治魅力正逐漸消褪，如同 Andrew Knapp 所指出的，「後戴高樂時代」乃始自 1965 年。<sup>25</sup>

儘管戴高樂在第二輪投票中以 54.5%對 45.5%得票率擊敗 Mitterrand，然而右派整合持續遇到阻礙，例如 Chaban 主張接近社會民主主義，但 Giscard 則相對強調自由市場機制。1966 年 1 月，Pompidou 以 Debré 取代 Giscard 的

<sup>21</sup> 實際上，RI 在經濟穩定和歐體整合等議題方面比較接近 CNIP 等保守派政黨，此外他們也都不是類似 UNR 的群眾型政黨。再者，由於 RI 認為兩黨結構有利於中間偏左或偏右政黨，因此在 1965 年主張將總統選制由兩輪制改成一輪投票制。

<sup>22</sup> 1990 年代初期，社會黨領袖 Michel Rocard 提出類似大整合 (big bang) 主張，但同樣歸於失敗，原因是共黨和中間政黨積不相容，直到 1990 年代中期兩黨同時式微後才有所改變。

<sup>23</sup> 另一位頗孚人望的左派政治家是 Mendès France，當時，許多人認為假使由他出馬挑戰戴高樂會有較高勝算。

<sup>24</sup> 在季斯卡政治算計當中，1962 年國會選舉 UNR 第一輪的得票率是 36%。1965 年，戴高樂在第二輪以 55%得票率當選總統。準此，RI 的選民基礎可望達到 20%。

<sup>25</sup> 見 Knapp, *op.cit.*, p.13. 有關戴高樂在 1965 到 1970 年間控制政局的努力，見 David Wilsford ed., *Political Leaders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Europe* (Westport CT: Greenwood, 1995), pp.85-86.

財政部長職位，RI 感到不滿；至於 Giscard 則在 1965 年 5 月成立「現實與願景」智庫後，又於 1966 年組成「獨立共和人士全國聯盟」，一方面自認為是國會多數派領袖，另一方面亦持續強調和 UNR 的區隔。雖然 Giscard 承認總統已經成為法國政治重心，但也強調 RI 偏好內閣制，並在 1966 年公開要求重新思考戴高樂主義意涵之後隨即於翌年表示，他對戴高樂派的支持並非毫無保留。儘管當時對於戴高樂派而言，討論後戴高樂時代是項禁忌，但他似乎已開始積極準備。

1967 年 3 月，法國舉行國會改選。RI 和 UNR 也在上述氛圍當中展開雙邊協商，雖然合作勢在必行，但是彼此間競爭激烈。由於戴高樂年事已高，雙方都想早點占到有利位置。UNR 提議在第一輪共推單一候選人，RI 則主張在右派內部進行初選，最後 RI 分得 83 個選區，並於第二輪結束後將席次從 1962 年 35 席增加到 42 席，UNR 則相對損失 30 多席。<sup>26</sup>至於在 CNIP 方面，它仍未從 1962 年慘敗中恢復元氣，無論是 1964 年郡級選舉或是 1965 年市鎮選舉，其成績都呈現持續下滑走勢；Pinay 雖試圖重振旗鼓，表示 CNIP 是自由與共和傳統的守護者，並致力於打破兩極政黨結構與整合中間選民成為第三勢力，但其反對力量仍遠不如社會黨和 MRP。<sup>27</sup>

做為基督民主黨人，MRP 在第四及第五共和初期都是支持戴高樂的重要力量，在阿爾及利亞和直接民主等議題上的立場甚至比保守派更接近 UNR，此外它也主張連結資本和勞動，讓勞工合理參與企業營運。因此在和 UNR 漸行漸遠過程中，與其說兩者政策立場存在重大歧異，無寧說 MRP 是不滿戴高樂的專斷獨行。更甚者，選民基礎重疊造成 MRP 和 UNR 的緊張關係。1962 年秋天的民調顯示，在各政黨中 MRP 選民支持戴高樂的比例名列前茅，此外在 1958 年國會選舉中，48% 的 MRP 支持者在第一輪便投給了 UNR 候選人，

<sup>26</sup> 隨著右派整合成功，密特朗說服 1965 年左派聯盟 (FGDS) 成員仿效採行單一候選人策略。1966 年 12 月 20 日，FGDS 和共黨簽署合作協定。雖然雙方未能就共同綱領達成共識，但同意在第二輪投票循由退選模式給予同個陣營候選人較大勝選機會。

<sup>27</sup> 1963 年 5 月，MRP 舉行黨代表大會。會中確認兩極政黨結構迫使它向戴高樂派靠攏。質言之，要想恢復過去國會中多極競合的運作有其困難。

這都使 MRP 處境困難：無論它支持或反對戴高樂，選民基礎都將逐漸流失。進言之，MRP 承認兩極結構不會因為戴高樂去留有所改變，但仍選擇中間路線。1966 年，法國政府修改國會議員選舉辦法，將進入第二輪的門檻從 5% 提高到 10%（此處是指得票數占登記選民比例），這使得第三勢力構想更加難以實現。1966 年 2 月，以 MRP 爲主的中間政黨組成「中道民主同盟」（Centre démocrate），表示如果社會黨要和它結盟，必須切斷和共黨連繫，至於 RI 若要和它結盟，則必須結束和戴高樂派的合作關係，結果中道同盟兩頭落空：社會黨和共黨組成左派同盟。RI 則選擇留在聯合政府。

在 1967 年 3 月國會選舉第一輪投票中，MRP 得到 12.6% 選票，其中多數是反對戴高樂的右派選民；由此可見，除了左右之外，右派內部浮現支持和反對戴高樂的裂痕，使後戴高樂時代形勢變得更加複雜。自此，UNR、RI 和 MRP 面臨同室操戈局面。在後戴高樂時代，威信中間路線比較具有整合號召力。<sup>28</sup> 部份因為左派維持合作紀律，右派勝選幅度縮小，甚至有敗選之虞。70% 選區的第二輪投票呈現出左右對決局面，兩極政黨結構愈發明顯。雖然右派在和共黨對決過程中勝多敗少，但共黨仍藉由結盟增加近一倍席次。面對即將到來的新一輪總統選舉，Pompidou 決定加快結盟腳步；他的目標包括控制 UNR 黨機器，以及整合國會多數。<sup>29</sup> Pompidou 雖在試圖說服國會多數組成單一黨團方面無功而返，但仍在 1967 年 11 月里耳黨代表大會中成爲 UNR 沒有爭議的主要領袖。從某個角度看來，戴高樂派和 Pompidou 派衝突可視爲右派內部的左右路線分歧。戴高樂派左翼人士試圖成爲國會多數中的第三勢力以制衡 RI 影響力，例如 Vallon 努力找出實現戴高樂「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外找出第三條路」的承諾，但 Pompidou 在里耳會議則強烈批評共產主義，且否認戴高樂派走回保守右派老路。

---

<sup>28</sup> 在這方面，兩點值得注意。第一，戴高樂本人始終擁有若干超黨派影響力。第二，1969 年以後中間偏右路線並未在右派內部競逐中占到上風。

<sup>29</sup> 在 UNR，龐畢度試圖以五位委員組成的執委會取代秘書長功能。這項嘗試被里耳黨代表大會推翻。稍後，席哈克和沙克吉在邁向總統之路的時候大抵遵循龐畢度建立的模式。

## 肆、1968 年事件與捍衛共和同盟

1968 年 5 月，法國發生大規模學潮和工運，參與罷工罷課的人數將近 1000 萬。左派政黨趁機發動倒閣，只差 11 票便能通過譴責案。5 月 24 日，戴高樂發表電視演說，呼籲人民經由公投賦予他推動改革的正當性，並以此決定其政治去留。但 Pompidou 不贊同這項構想，他建議戴高樂應解散國會，並訴諸選民進行裁決。<sup>30</sup>由此，兩人關係開始出現變化；主要是戴高樂認為 Pompidou 沒有落實第三條路政策才引發勞工不滿。

回顧起來，這起事件可說是戴高樂派由盛而衰的關鍵。表面上戴高樂成功渡過難關，但實則兩項發展不啻替戴高樂派敲響警鐘；首先是 Pompidou 失去 6 年以來的總理職務，其次是戴高樂派內部傾軋浮上檯面，由此開啓它逐步走下坡的 4 個階段（1969 年戴高樂辭去總統，1974 年戴高樂派失去總統職位，1976 年戴高樂派失去總理職位，1981 年戴高樂派和友黨面對右派潰敗）。法國在 1974-88 年間三次舉行總統選舉，但戴高樂派候選人在第一輪投票中，得票率都從未超過 20%，甚至從 1974 年 Pompidou 去世到 1995 年 Jacques Chirac 當選，戴高樂派連續 21 年未能出任總統。

在戴高樂宣佈將根據公投結果決定個人去留後，左派和中間政黨隨即進行合縱連橫。同年 5 月，學生組織和 Mendès-France 領導的團結社會黨（PSU）舉行大型集會，Mitterrand 不僅受邀參加，並表示一旦戴高樂辭職，將隨即投入總統選舉，同時建議由他本人或者 Mendès-France 組成臨時政府。在這個關鍵時刻當中，Pompidou 決定介入；他認為戴高樂訴諸公投的決定是項錯誤，政府該做的應該是解散國會，因為連日來暴動和罷工替人民生活帶來不便，執政黨可望得到多數選民支持。戴高樂最後接受這個建議，並於 5 月底透過廣播

---

<sup>30</sup> 同樣持反對立場的還有做為最高行政法院的國務院（Conseil d'Etat）。它表示戴高樂指稱的改革事項不涉及憲政議題，倘若舉行公投有違憲之虞。

宣佈解散國會進行改選。對此，50 萬人民走上街頭慶祝並支持上述決定。與此同時，UNR 改組成捍衛共和同盟（UDR），並且得到 Giscard 派加入。選舉結果，戴高樂派以 46.4% 得票率獲得過半的 293 席（總額是 487 席），超越在 1962 和 1967 年表現，同時首度追平戴高樂在 1965 年總統選舉的得票率。<sup>31</sup> 選舉期間，Pompidou 的能見度遠遠超過戴高樂，使其接班人地位益形鞏固，並預告後戴高樂時代的來臨。戴高樂內心的五味雜陳不難想見。

選舉過後，戴高樂隨即於 7 月批准 Pompidou 辭呈，任命 Maurice Couve de Murville 出任總理，這項決定被解讀成功高震主和過河拆橋；儘管 Pompidou 民調支持度不墜，但只有少數右派領袖給予支持，包括 Giscard 和 Chirac。1969 年 1 月，Pompidou 在羅馬表達未來參選總統意願。戴高樂的繼任人選問題浮出檯面。Pompidou 在參選演說中強調自由和保守概念，並和戴高樂做出某種區隔，而其「新戴高樂主義」的主張也得到多數 UDR 國會議員贊同，並推舉其擔任 UDR 黨團榮譽主席，從而讓他和戴高樂的關係跌到谷底。

1968 年 6 月國會選舉也確認 UDR 在右派陣營的盟主地位；當時 UDR 和 Giscard 黨人在 49 個選區進行如同初選般的角逐，但在第一輪投票中，RI 只在 12 個選區領先 UDR 候選人。因此，1969 年 RI 和 UDR 的關係持續惡化。同年戴高樂試圖再度運用公投推動改革，並藉此鞏固自身權力基礎，議題包括參院產生方式和權限以及強化行政區（région）功能等；雖然 Pompidou 不贊成這項公投，但仍投入正方陣營。除了 RI 之外，Lecanuet 率領「中道同盟」表達反對立場並不斷提到 1962 年的反對聯盟。4 月 27 日，戴高樂提出的公投案得到 47.6% 選票，未獲通過。約有 400 萬名右派和中間選民投身反對陣營，大略是 1962 年時的兩倍，不過反對者仍以左派居多；戴高樂隨即於次日宣佈辭去總統職務，而 Pompidou 則宣佈投入總統改選，由此開啓法國政治發展的另一局面。

---

<sup>31</sup> 左派的共黨和社會黨以及中間政黨受到重挫，Mitterrand 被迫在 1968 年 11 月辭去左派聯盟主席職務。

## 伍、結論

自 1946 年以後，戴高樂替法國右派所建立深厚的選民基礎，在第五共和時期發揮效用。從 1958 到 1974 年，以及從 1995 年到今天，戴高樂派共贏得 6 次總統選舉，入主總統府凡 26 年，超過其他政黨總和。從政黨結盟角度來看，兩項因素至為關鍵：首先是它能維持右派內部主要政黨的地位，其次則是它能有效處理和極右派、中間政黨，乃至於與左派的結盟關係。根據本文分析顯示，結盟成敗往往決定了戴高樂派及右派的選舉勝負。在主要政黨方面，無論 RPF、UNR 或 UDR，都曾讓其他右派和中間政黨相形見绌，甚至 MRP 的選民基礎在 1947 和 1958 年還相繼受戴高樂派鯨吞蠶食，只有中間溫和保守派能與其抗衡。CNIP 在 1954 年同時取得總統和總理寶座；1962 年後，RI 始終在聯合政府當中占有一席之地。1969 年，部份因為 Giscard 站在公投的反對陣營當中，戴高樂被迫辭職下台。

在政黨結盟方面，戴高樂擁有的超黨派影響力非他人能及，因此在 RPF 和 UNR 成立之初，戴高樂都刻意和他們保持距離。根據 1990 年代民意調查顯示，除共和聯盟（RPR）之外，民族陣線（FN）、民主同盟（UDF），乃至於多數社會黨選民都自認為是戴高樂派。相對地，除 1958 和 1962 年外，假設戴高樂派拒絕和其他政黨結盟，也得付出代價，例如在 1951 年便因此失去取得國會多數的機會，這些都顯示出在法國政黨結盟的重要性。

